

用商品经济观念正确认识 “两通突破”的战略决策

罗 时 祥

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两通突破”的战略决策,是一个重大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这对于正确选择武汉改革与发展的长远方向和目标十分重要。本文拟对若干似是而非的观点和议论作一分析,并就武汉改革的深化提出粗浅意见,就教于大家。

一、“两通突破”决策的缘由及要旨

近几年来,人们对“两通”突破的讨论和争议其焦点之一是对“两通”决策本身认识不一致,因此,回顾一下这一决策的全过程有助于我们历史地、客观地、全面地认识和评价“两通”。

“两通”作为武汉改革与发展的突破口,从酝酿到决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的起步阶段。1979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进行,在农村改革初见成效的同时,城市也在酝酿改革,城市改革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突破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封闭、封锁和分割,变城市单一的生产基地为多功能经济中心,充分发挥城市大市场的作用。因而城乡开通搞活商业成为当时的矛盾的焦点。

在上述历史背景下,武汉市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分析了武汉市的优势,一是工业基础比较雄厚,工业是城市经济的基础和主体;二是交通发达,地理位置适中;三是商业发展的条件比较优越,潜力很大;四是科技力量比较集中。在上述四大优势中,有两个突出的特色,即交通和流通,这是武汉所处的地理位置和长期的历史发展所形成的,是其它城市不可取代的优势,但由于指导思想和旧体制的制约,这种优势和特色远远没有发挥出来,必须从改革入手,恢复和发展武汉历史上交通中心和流通中心的地位和作用。这些认识为后来提出战略设想打下了基础。第二阶段是武汉发展战略的充分酝酿阶段。1983年4月,新一届政府成立之后,上述调研就发展成为武汉发展战略与武汉综合改革的探讨,1983年5月开始,长江日报开辟专栏讨论武汉的发展战略问题,李崇淮同志的“两通起飞”论就是在此期间提出来的。对这场热烈的讨论,市委市政府领导同志一直表示极大的关注和兴趣,把它看作决策的必经过程,并多次参加专家座谈会和咨询讨论会,鼓励、支持各方面把意见都讲出来,力求做到“兼听则明”。第三阶段是决策阶段。使决策富有科学性和民主性,在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市委市政府委托有关单位、团体和我市有关研究部门于6月上旬组织了一次高层次高水平的咨询讨论会,除地方名流外,一些全国著名的专家学者如童大林,于光远,钱俊瑞,宦乡,刘明夫,林凌等都到会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6月下旬,市委市政府在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将“两通起飞”的战略构想修改为“两通突破”的改革战略方针,由

此拉开了武汉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序幕。应该说，“两通突破”的改革并不是某一个学者闭门造车的一时“灵感”，而是集中了广大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部门同志智慧的结晶，它也不是少数领导“拍脑袋”的产物，而是在充分咨询论证的基础上科学化、民主化的决策。

“两通突破”之所以被誉为“一个有胆识的决策”，主要是在当时旧体制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两通”对旧体制的封闭、保守和自给自足是一种巨大的震动和冲击。起码在流通——这一旧体制的最薄弱环节打开了缺口。为新体制的生长创造了必要条件。正是这种敢为人先的开拓进取精神，开创了武汉综合改革的新局面，对全国许多城市的改革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两通突破”的要旨在于打开产品经济体制的缺口，从市场放开起步，创造搞活企业、搞活城市、发展商品经济的环境和条件，探索一种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模式。“两通突破”正好抓住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找到了发展商品化经济的一把钥匙。

二、“两通突破”的现实评价

从实施“两通突破”的战略方针到现在已整整四年多了，武汉改革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当然也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但对这四年的现实评价标准和观念不同，结论也会不一样，有的同志认为，“两通突破”富了别人穷了自己，武汉吃了亏，放进来的商品成了“过路财神”。这种观点，是用产品经济的旧观念来看待城市的作用与功能。在产品经济体制下，城市只是一个产品生产基地，衡量城市的地位和作用的标准是工业总产值的多少。发展商品经济，经济活动就呈现出社会化，多元化的局面。城市作为商品经济活动的中心，其功能就不仅仅限于工业生产，而应是流通中心、交通中心、金融中心、科技中心，当然也包括工业中心等等，商品经济要求城市不能仅仅自我服务，自我内部循环，而必须发挥吸引力，辐射力和综合服务能力，推动和促进区域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寓自己的发展于区域发展之中。“两通”正是发挥城市多功能经济中心作用的基础条件，现代商品经济，“两通”越是发达，越能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这已为国内外经验教训反复证明。

所谓“富了别人穷了自己”，放进来的商品成了“过路财神”，无非是指外地商品通过武汉这个市场实现了价值，或者是指周围地县几十万劳工在汉务工经商发了财；总之是在武汉受益吧。这没有什么不好，恰恰相反，它正好表明武汉这个中心城市在发挥“中心”的作用。在我们看来，这种作用发挥得还不够充分，需要有一个巨大的、持久的发展。外来商品与武汉商品抢占市场，实际上是引进了竞争机制，可以迫使武汉的企业去竞争、去拼搏，去寻找生存和发展的契机。所以也是好事。如果不打开城门，武汉的企业可能不会受到目前这样大的冲击，企业也难以自我觉醒。

事实上，只要正面迎接开放的挑战，主动参与市场的竞争，武汉的企业走出困境是可能的。“两通突破”以来，武汉一批企业在竞争中崛起。如武汉汽轮发电机厂、武汉自行车一厂、二厂，武汉印染三厂，武汉化工机械厂等等。这些企业成功经验很多，但共同的一条路就是在开放的环境下，不等待政策的优惠，不怨天尤人，不畏缩不前，而是充分利用开放带来的压力、冲击和有利条件，着眼于转变观念、转变经营机制，改造管理方式，提高企业整体素质，使企业在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这是成功企业给我们的启示。

还有的同志用近来武汉工业发展速度不快，缺乏“拳头产品”的现状来证明“两通突破”的决策有所失误。应当看到改革期间不能把发展速度推得太快，这样会形成紧张的经济气氛；

不利于改革的深化,而1984年底以来我国的经济一直过热,在这种情况下盲目地攀比速度,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有害的。再说一些老工业基地面临困难较重,需要休养生息,调整结构,改造技术等,发展速度就会慢一些。我们大可不必为一时速度低而焦虑不安。武汉拳头产品不多,特别是耐用消费品方面拳头产品较少是客观事实。但这并不是“两通突破”带来的。不能把武汉拳头产品少的原因归结为“两通”。恰好相反,不开放,不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永远也不会出现拳头产品。“两通突破”正有利于发展武汉的拳头产品。我们要把拳头产品与武汉的重化工业优势结合起来,与国家的布局要求结合起来,一方面争取在轻纺工业中发展出若干拳头产品,另一方面更多地重工业中开发出“大拳头”和“重拳头”。

现实评价还涉及到对“两通”本身的认识。有的同志认为“两通”并未突破,要素市场没有通,对外开放没有通,交通也没有通。

“两通突破”并不是一个短期的策略或权宜之计,而是一个中长期的战略方针,不能因短三、四年时间而论其成败;应该用战略眼光、历史眼光来看“两通”。事实上,这几年在消费品流通方面,敞开三镇大门、开放市场、大力发展以武汉为依托的商品流通网络,对国营商业的经营思想、经营方式和社会商业结构、批发体系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逐步建立起了开放式、多渠道的商品流通体系,这方面成绩是很大的。勿庸讳言,流通领域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混乱,解决流通领域秩序混乱问题,关键是整顿、清除和严处“官倒”;对绝大多数正当从事商品交换的企业则用法律来规范其行为,促其诚实经营、合理竞争,继续繁荣市场,繁荣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我们切不可因“官倒”存在而否定这几年流通改革的成就,切不可限制正常的合理的商业发展。

“两通”中的流通是大流通大市场的概念,它还包括生产资料市场、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企业产权市场等。在这些方面,武汉都作了一定的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由于这些市场的发育完善主要取决于整个国家的改革进程和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因此,这些市场(可以统称为要素市场)的发展难度更大一些。

至于有的同志说到武汉对外开放尚未突破,也不很确切。1985年以来,武汉对外开放出口贸易两年翻了三番(1987年为2亿美元)引进外资工作也已初见成效。毫无疑问,对外开放正是我市两通突破深化的又一个战略任务。

关于交通,这几年虽然做了一些改革,但确实还不能说真正通了,突破是很有限的。这里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体制上的特殊性,即水陆空交通分属三个条条管理,虽然都在武汉,但很难统一在一起,而且是否统得起来主要不取决于地方。二是建设上的特殊性,因为交通要有明显的改善,除完善管理以外,根本在于加强投资建设。尽管如此,交通还是有进展的。议论了多年的武汉国际机场终于列上国家“七五”计划,汉口火车站外迁扩建已经动工,长江公路大桥、阳逻深水港的建设,前期工作正在积极准备之中。这些大型骨干交通工程建成之后,将有效地发挥武汉交通中心的作用,并促进其它功能的发展。交通中的市内循环,目前仍是一个薄弱环节。交通不畅,并不表明我们选择两通失误了,过去和现在的情况只是一再证明了交通的重要性,如果不突破,不通畅将对城市的正常运转、对城市多功能的作用形成严重障碍。武汉如此,全国如此,因而这正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和重点。

三、新形势下推进“两通”战略的宏观对策

回顾四年多来的实际,有这样几条经验教训值得在今后的工作中引起注意。第一,必须

正确处理增强实力与发挥功能的关系，实力出功能，没有实力，发挥城市的功能，就会遇到困难，城市功能的培育与发挥，又有助于增强城市的实力即吸引力、辐射力和综合服务能力。第二，必须正确处理好搞活企业与搞活市场的关系，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没有企业对价格、供求关系以及宏观调控政策的灵敏反映，市场是建立不起来的，因此必须从搞活企业着眼，使企业改革与市场机制的发育同步。第三，必须正确处理突破旧体制与建立新秩序的关系，把立足点和着眼点主要放在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上。第四，必须正确处理城市开放与统一市场的关系，在一个封闭性占主导地位的体制下，某一个或几个城市、地区之间的开放是不可能形成全国统一市场的，而必须各地同时，同等程度地开放，才有助于建立全国统一市场，才能使各地区，各城市，各种类型的企业在同一水平线上展开合理竞争。

根据这些原则，最近两年武汉改革与发展总的思路是：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整顿经济秩序，治理经济环境，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在调整的过程中不失时机地迈出若干具有实质进展的改革步伐，推动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市场秩序的健全，使“两通”在新形势下得以深化和完善。

第一，要采取若干应急措施：把当前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严重存在的不稳定因素尽快消除，有效地驾驭当前的局势。这方面的突出工作，一是清理和整顿“官倒”，二是清理和处罚为政清廉中的各种问题。在全市各级党政组织开展党风政纪的大检查，树立起“廉洁、公正、高效”的政府形象。要采取经济和行政等综合措施，严格控制物价上涨，使今年的物价上涨指数明显低于去年。对一时供应难以改善，而需求又很旺盛的高档耐用消费品一方面努力增加供给，另一方面不能贸然开放价格管制。治理经济环境，主要是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要严格按国家计划规定的投资规模进行改造和建设。对武汉的重点产业和优势行业予以支持，对长线产业、长线产品坚决压缩；对供需基本平衡的产业和产品，逐步放松改进管理，让市场机制较充分地发挥作用；对楼堂馆所等非生产性建设坚决限制。

第二，以搞活企业为中心，改革产权制度，建立公有股权占主导地位的新型股份制，全面改造国有企业的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机制，为新型“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运行机制的形成创建微观基础。在治理整顿的过程中推行股份制，有利于为经济发展筹措资金，分散消费基金的使用方向，减缓市场压力；有利于增强劳动者对资产的关切度，增强职工的积极性和主人翁的责任感；有利于企业端正行为，追求企业长远发展的后劲，从而解决承包难以克服的短期行为。使企业真正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企业股份制的实行，将彻底改变国有资产无人负责，无法增殖的状况，创造资产存量商品化，市场化的制度前提，从而将极大地提高现有数十亿国有资产的经济效益和效益，这不单是一个产权市场的意义，更主要的是构造了整个市场经济的基础——真正的企业，企业从此方才成为竞争性市场的主体。

第三，以优化劳动组合为契机，不失时机地迈出就业制度改革步伐，实行有限失业的制度。对失业者可以采取多种措施进行妥善处理和安排：①企业内部开辟新的就业门路；②失业期间就业再培训；③对失业者提供必需的生活保障，健全社会保险制度和劳动组织体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打破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真正激发起职工的危机感，竞争意识，持久地调动起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失业制度的实行，客观上会促使目前的社会人力资本在本社会范围内自由流动，自由组合，自由竞争。这是继产权市场开辟之后的又一重大突破——人力资本市场的开拓。它的消极影响固然存在，但积极作用将远大于消极作用，它为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和空间。

第四、加强和改善政府经济管理部门对宏观经济的调节和控制，充分发挥金融部门在宏观管好、微观搞活中的推动作用。这次治理和整顿，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是加强宏观控制：控制通货膨胀率，控制物价上涨率，控制国民经济(主要是工业)增长率，控制固定资产(主要是非生产性)投资规模、控制消费需求(主要是集团消费和工资外消费基金)，这样一种全面紧缩和控制的战略方针是非常及时、非常必要，也是非常正确的。问题在于：我们是用传统的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方式去紧缩，还是按商品经济本身的规律和要求去灵活机智的调控以达到既控制宏观又搞活微观，且活而不乱，活中有序？显然后者是我们所应追求的目标。

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金融调控体系是这一职能和任务的承担者。因此，必须把金融体制的改革和金融工作的改进提到十分重要的地位，充分发挥好金融的调节作用，处理好几个方面的关系：一要正确处理全面紧缩与结构调整的关系，把注意力和着眼点放在调整信贷结构和产业结构上。全面紧缩主要是总量上的控制，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结构调整则要求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有压有保，有大压有小压，有破产倒闭，也有兼并和扩张，这就要求金融部门区分轻重缓急，灵活掌握控制的幅度和力度，既保证压的目标实现，又不使整个经济大伤元气，更不能导致经济全面萎缩。二要正确处理控制需求与增加有效供给的关系，把注意力和着眼点放在努力增加有效供给上。目前的社会需求总量无疑是过大，必须坚决压下来，但在总需求中既有合理正常的部分，也有非正常的因素，因此压缩主要是指后者而言，如果不分主次，不分正常与非正常，一刀切地压下来，必然难以调整需求结构，难以正确引导消费方向，而需求结构不改变，反过来又影响生产结构和供给结构的调整。为此，必须从压缩需求总量和调整需求结构入手。进而调整供给结构，努力增加有效供给，以保证有效需求的满足，建立起供给与需求的良性循环。三要正确处理基础工业与兴新工业的关系。基础工业中能源，原材料必须继续大力发展；新兴工业主要是突出重点，在有限领域内进行开发以保持和跟踪国际水平，日用消费品工业主要是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经济效益，通过内涵扩大再生产增加消费品市场的供应。四要正确处理乡镇企业与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关系，亦即小城镇与大中城市的关系。必须优先扶和鼓励大城市的发展，充分发挥大城市生产基地的作用，发挥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通过搞活大城市、大工业基地来改造产业结构，增加有效供给。对中小城市，集镇和乡镇工业必须有所限制，否则整个经济外延型发展的格局难以改变。

第五、若干风险较小，效果较好的改革措施宜于尽早出台，以保持调整时期改革的渐进性和连续性，为全面配套改革创造环境和条件。有些改革措施可以陆续出台，如税制改革，在大中城市率先实行分税制改革的试点；房地产制度改革，加快公房私有化的步伐；加强和改造政权建设，发挥党和政府在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领航作用。建立和健全各种社会管理，社会保障，社会监督，社会公正组织，加强社会的自我管理，自我调节，使整个社会步入有序之列。